

民国时期中央大学的学术与政治

(1927-1949)

蒋宝麟 著



大学与现代中国
◎ 主编 朱庆葆

学出版社



蒋宝麟 著

民国时期中央大学的学术与政治
(1927-1949)

大学与现代中国 ◎ 主编 朱庆葆

南京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民国时期中央大学的学术与政治：1927—1949 / 蒋宝麟
著. —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8
(大学与现代中国 / 朱庆葆主编)
ISBN 978-7-305-17692-0

I. ①民… II. ①蒋… III. ①高等学校—教育史—研
究—中国—1927—1949 IV. ①G649.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243325 号

出版发行 南京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 邮 编 210093
出 版 人 金鑫荣
丛 书 名 大学与现代中国
书 名 民国时期中央大学的学术与政治(1927—1949)
著 者 蒋宝麟
责任编辑 官欣欣 李鸿敏 编辑热线 025-83593947
照 排 南京南琳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印 刷 南通印刷总厂有限公司
开 本 700×1000 1/16 印张 29.75 字数 397 千
版 次 2016 年 8 月第 1 版 201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5-17692-0
定 价 88.00 元

网址：<http://www.njupco.com>
官方微博：<http://weibo.com/njupco>
官方微信号：njupress
销售咨询热线：(025) 83594756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所购
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序 言

朱庆葆

现代意义上的大学起源于欧洲。19 世纪以来,随着西方文明在全球范围内的帝国主义化和殖民化,大学在全世界迅速扩展。著名的比较高等教育学者许美德将这一进程称为“欧洲大学的凯旋”^①。是否是“凯旋”姑且不论,但大学的扩展给世界各国带来了深远的影响。

(一)

中国传统意义上的高等教育机构源远流长。远者如起源于汉代的太学,鼎盛时期东汉太学生多达三万;近者如宋元以来的书院,讲学之风兴盛,一时蔚为风气。但现代大学在中国的出现,至今不过百余年的历史,梅贻琦便曾指出:“近日中国之大学教育,溯其源流,实自西洋移植而来。”^②作为一种新兴的组织机构,中国大学自诞生之日便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在现代中国波澜壮阔的变迁历程中,大学以及活跃于大学场域的社会群体,对中国的历史进步和社会发展产生了广泛且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仅表现在教育、学术和文化领域,而且触及政治的更替、民族的救亡和广泛意义上的社会变革。

首先,大学是推动中国学术独立和文化重建的中心。从根本上

^① [加]许美德:《中国大学:1895—1995 一个文化冲突的世纪》,许洁英译,教育科学出版社,2000 年,第 32 页。

^② 梅贻琦:《中国人的教育》,中国工人出版社,2013 年,第 12 页。

来说,大学是由学者组成的学术性组织,并以知识的生产和传播为本职。蔡元培说:“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① 强调的就是大学以学术为本位的组织特征。近代以来,在现代西方学术和文化冲击下,中国传统的知识体系和价值观念分崩离析,如何构建现代中国的学术和知识体系,推动中华的文化重建,是大学不可替代的历史责任。罗家伦在就任清华大学校长时说:“要国家在国际间有独立自由平等的地位,必须中国的学术在国际间也有独立自由平等。”^② 并把追求学术独立作为新清华的使命。胡适在 1915 年留学美国时也说:“中国欲保全固有之文明而创造新文明,非有国家的大学不可。”学术独立和文化重建,是百余年来大学孜孜以求的理想。^③

其次,大学成为新兴知识分子汇聚的舞台和社会流动的新阶梯。随着科举的废除和现代学校体系的建立,大学这种新兴的学术机构成为城市知识分子安身立命的新场域。知识阶层在从传统的“士人”向现代知识分子的转变中,学术成为一门职业,使他们在大学找到了施展抱负的舞台,并致力于构建“学术社会”的努力。而对于有着数千年以读书为进身之阶传统的中国社会,“上大学”也成为各个阶层谋求改变社会地位、实现人生理想的重要途径。大学成为社会晋升阶梯中至关重要的一环。

再次,大学是政治变革的先导者和国家建设的担负者。大学还深度介入到现代中国的政治变革和国家建设之中。大学对政治和社会有着敏锐的洞察,并有着致力于国家政治建构的时代担当,屡屡成为政治变革的先导力量。正所谓“政治一日不入正轨,学子之心一日不能安宁”^④,大学因其特殊地位和知识阶层汇聚的特征,成为近代政党鼓吹主义、发展组织、吸纳成员的重要场域。使得每一次政治变

① 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3卷,中华书局,1984年,第5页。

② 罗家伦先生文存编辑委员会:《罗家伦先生文存》第5册,台北“国史馆”,1988年,第18页。

③ 姜义华编:《胡适学术文集(教育)》,中华书局,1998年,第23页。

④ 刘伯明:《论学风》,《学衡》1923年第16期。

动,都在大学有着相应的呈现。同时大学作为国家培育人才之地,又是国家建设的砥柱中流。如何服务于国家战略目标,应对政府的意志和需求,也深刻体现在大学的知识生产和人才培养之中。

最后,大学是推动中华民族救亡和复兴的先驱力量。在 20 世纪上半叶国难深重的时代环境中,大学体现出了沉毅的勇气和担当的精神,成为民族救亡的先驱。这不仅仅体现于五四运动、“一二·九”运动这些重大的爱国事件,也表现为大学为推动中华民族学术独立所做的不懈努力。而在当前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作为现代社会的“轴心机构”,大学是时代的引领者,也是社会进步最为重要的推动力量。

(二)

由此看来,现代中国的大学早已不再是那种潜心于学术创获的“象牙之塔”,其“担负”是如此沉重,乃至难以承受。这也使得人人都在评论大学,但在如此错综复杂的矛盾纠缠中难得要领。

在大学与外界复杂的互动中,大学与国家、大学与政府的关系尤为引人注目。虽然在民国时期曾存在为数不少的私立大学(包括教会大学),但公立大学是现代中国大学的主体。在这种制度环境下,大学受国家政治变动和政策变化的影响更为直接、显著;而大学对外界政治的反应和参与也显得积极且主动,卷入的程度也更为深切。大学与国家、大学与政府的关系对于理解学术与政治、知识与权力在现代中国大学场域的运作和交互影响提供了很好的视角。

在现代中国,大学是培养国家精英和社会栋梁之所,对于国家的发展和社会的变革有着重要的影响。曾任中央大学校长的罗家伦说过:“后十年国家的时事就是现在大学教育的反映,现在的大学教育好,将来的情形也就会好,现在的大学教育坏,将来的情形也就会

坏。”^①国家的命运和大学教育的得失成败密切相关。现代中国社会的精英阶层来自于大学,他们在大学中接受的知识训练、选择的政治立场和养成的文化主张,都深刻关系到国家和社会未来的发展方向。

国家和政府对大学的影响则显得直接且强烈。现代中国的大学是国家教育系统的组成部分,被纳入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进程,紧密服务于国家现代化建设和民族性知识生产的需要。国家意志和政府需求深刻影响着,乃至主导着大学的知识生产和传播。大学生产什么样的知识,怎样生产知识,培养何种人才,都紧密围绕国家的目标展开。这既有权力对知识的引导,也有大学对国家需求的主动适应。急国家之所急,想政府之所想,所谓“与民族共命运、与时代同步伐”,大学与民族国家的建构紧密结合在一起。

国家对大学的影响还突出体现在意识形态上的控制。无论是清末的忠君尊孔,还是国民政府时期的三民主义教育,抑或是此后的无产阶级专政,政府都把大学视为灌输主流意识形态、加强思想文化统治的主要场域。通过引导、规范乃至钳制大学的知识生产和传播,国家意志和党派观念对于大学学术自由和创造性的知识生产都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三)

基于上述理解,我们组织编写了这套“大学与现代中国”丛书。从宏观上来讲,该丛书的主旨有两个。

第一,以大学作为观察和认识现代中国社会变化的一个重要的着力点。著名教育学家弗莱克斯纳曾说过,大学“是时代的表现”,它“处于特定时代总的社会结构之中而不是之外”^②。大学不是抽象的概念、结构和组织,大学是它所置身的社会环境的体现。对于大学的

^①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教育(一),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287页。

^② [美]亚伯拉罕·弗莱克斯纳:《现代大学论——美英德大学研究》,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页。

研究不能局限于大学本身,而要把它置于周遭复杂的社会、政治、文化环境之中,来展示大学对于更为广阔的历史发展和社会变迁的影响。现代中国的社会精英阶层绝大部分都在大学接受教育,他们的知识结构、政治主张、文化立场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在大学中形成。通过培育社会的精英阶层,大学对于现代中国的历史发展和社会变迁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对中国社会变化的理解,难以绕开大学。不理解大学,不理解大学培养的社会精英,不理解大学在知识生产、社会流动、政治变革和社会变迁中的作用和影响,就很难对现代中国的历史发展和社会变动给予深层次的阐释和解读。

第二,为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大学建设道路提供鉴戒。当前,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体现民族文化的大学 and 高等教育体系已经成为国家的意志。这既需要有国际视野,学习西方国家的先进的办学经验;同时更需要有本土情怀,继承现代中国大学发展历程中积累的丰厚历史遗产。作为一种西方文明的产物,大学要植根中国大地,才能生根成长、枝繁叶茂。如何形成自身的大学理念、大学模式和学术文化传统,如何处理大学与国家、大学与社会的关系,近代以来的中国大学有着卓有成效的探索,并积累了很多经验,当然也有教训。这些在今天都需要给予认真的反思和总结,并根据时代环境的变化加以采择。

英国教育家阿什比曾说过:“任何类型的大学都是遗传与环境的产物。”^①所遗传的是大学对于知识创获和文化遗产的一贯责任,而面对的则是变动的历史环境和互异的文化土壤。希望“大学与现代中国”丛书能以大学作为切入点,加深对于现代中国的理解,加深对于大学的理解,加深对于现代中国大学的理解。

^① 杨东平编:《大学二十讲》,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74页。

目 录

绪 论	1
第一章 中央大学建立初期的教育体制与“后革命”氛围中的校园政治	12
第一节 打倒“东南学阀”:国民党对东南大学的接收与改组	13
第二节 新教育体制的确立:大学区制与大学本部组织结构的调整	22
第三节 “党化教育”与建校初期的校园政治生态	31
第四节 止水微澜:免费运动、驱胡运动与校名风波	40
第五节 大学院和大学区体制下的中央大学校长	49
第六节 学生政治与学界派系之纠结:张乃燕的下台	57
小 结	63
第二章 曲折的“中央化”进程:从朱家骅到罗家伦时期的中央大学	69
第一节 朱家骅的上任及其革新措施	70
第二节 选校长、等校长、打校长:中央大学校长人选悬案	79
第三节 中央大学的解散与“整理”	88
第四节 罗家伦的安校之道	98
第五节 首都大学迁移与“集体记忆”:罗家伦的“大学城”计划	106

小 结	118
第三章 中央地方财政格局与大学“再国立化”:抗战前中央大学经费问题考察	121
第一节 国省财政划分与江苏省教育经费来源的变化	123
第二节 大学区体制下各级教育经费分配的矛盾	129
第三节 大学区制废止与各方关于中央大学经费问题的博弈	136
第四节 中央大学经费的“半国立”困境及其终结	142
第五节 国家教育文化预算的建立与中大“再国立”	150
小 结	158
第四章 抗战时期中央大学的内迁与大后方校园生态	163
第一节 抗战爆发与罗家伦的因应	164
第二节 中央大学在后方的重建与课程体系	173
第三节 “战时”与“平时”:抗战时期中央大学的教育体制	180
第四节 战时中央大学的校园生活与“战时民族主义”	187
小 结	197
第五章 国家与大学政治文化:抗战时期中央大学的“易长”问题	199
第一节 “经费”、“纪纲”与罗家伦的离职	200
第二节 国民党派系政治与“学术自由”的诡论性互动:顾孟余的继任与离任	207
第三节 从“最高领袖”到“知名学者”:蒋介石、顾毓琇和吴有训	214
小 结	223
第六章 战后政局变动中的中央大学	225
第一节 从重庆到南京:中央大学复员经过	226
第二节 中央大学经济状况及其政治影响	232
第三节 校长、学校与政局:吴有训辞职风波	239
第四节 “学术权力”的异音:中央大学“解聘教授”事件	250
第五节 战后学潮:内战背景与校园政治	258

小 结	270
第七章 走向南京大学:1949 年中央大学的“应变”与抉择	272
第一节 中央大学的“应变”准备:迁或留?	273
第二节 “从没有校长到不要校长”:校务维持委员会与“应变”	277
第三节 “应变”期间的校园生活与政治氛围	286
小 结	296
第八章 中央大学的国共组织及其政治活动	298
第一节 抗战前中央大学的国民党组织的演变	299
第二节 战时国民党中央大学直属区党部及其活动	310
第三节 战时中央大学的三青团组织及其活动	323
第四节 战时中共组织活动的限制	329
第五节 战后学校国民党党团组织形态演变与中大党团组织	339
第六节 战后中央大学的国共斗争	346
小 结	352
第九章 南北新旧之分合:中央大学学术文化的侧面	354
第一节 “后学衡”与“后国学”:中央大学的“旧学”形象	356
第二节 “史学南派”:中央大学史学的变与不变	366
第三节 理念、权势与学术隔阂	376
小 结	384
第十章 国家与中央大学“实科”之发展	387
第一节 国家教育政策与中央大学的实科设置	389
第二节 国防、经济建设与工程学系的兴办	395
第三节 “建教合作”的不同模式及其实效	400
小 结	408
结 论	409
参考文献	424
索 引	450
后 记	461

绪 论

在中国近代历史上,大学从其创立之初就开始深刻地介入学术建构和国家建设(State-building)之中。^① 中国大学制度的形成和高等教育的发展,有着与西方国家极为不同的历史情境和路径。一方面,中国的近代大学源自晚清的洋务学堂,其对于“西学”的择取往往从发展军事和工业的实际功利目的出发,并主要由政府推动,具有浓厚的实用主义和工具主义特征。随着 20 世纪二三十年民族危机的加深,上述倾向更为明显。另一方面,中国大学始终与国家(含中央与地方)处于一种胶着而又复杂的关系网络之中,总体而言,中国大学的“自由主义”为教育上的国家统制所逐渐挤压。

近代中国大学处于社会政治的变革时期,趋新尊西的大潮在大学校园内时时激荡,因而呈现出许多非同寻常的历史面相。若从学术层面而言,“古今中外”各种歧异的思想学术资源在大学这个特定的教育场域中得到汇聚和“博弈”。而从政治层面视之,中国大学中师生两个群体的知识精英则有意或无意(恐怕在更多时候还是“有意为之”或“情非得已”)地卷入近代中国政治的纵横分合之中。而且特

^① 关于中国大学诞生的时间,说法颇多。金耀基认为 1905 年废科举、设学校是中国教育制度关键性的“现代转向”,而北京大学是中国现代型大学的开端,实是借鉴西方大学,所以中国的现代大学是“横向的移植”,而非“纵向的继承”。参见金耀基《大学之理念》,北京:三联书店,2001 年,“牛津版序”第 2 页。陈平原则以《中国大学百年?》(收入陈平原:《中国大学十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 年)为题,辨析“中国大学”的内涵,提出“百年中国大学”之论。

别具有谠论意味的是,科举制的废除本使道治二统分离,学术独立的观念从清季起便有人鼓吹,到民国更成为主流;但民国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反而呈现出比以前更政治化的倾向:知识界议政不断,也不乏直接参政者(其中学生多于老师)。^① 大学师生的议政与参政更往往与中国近代的民族主义运动、国家统一运动、左右党争乃至党内派系纷争发生直接的关联。

近年以来,中国大学的历史与文化一直都是学界关注的热点,教育学、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乃至文学史学者均对此问题倾注了心力。此种多学科开放对话的学术努力,当可开启若干多元互动的研究新视角。

高等教育史的研究大致可分为教育通史和大学个案研究两种模式。国立大学的个案研究在其中占有重要的分量,但是既存研究有一个倾向,就是学者大都将目光投向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及其后续的西南联合大学。任以都教授在《剑桥中华民国史》中指出:“北大作为第一所国立大学的地位,明显地标志着高等教育与国家建设的关系。更全面地进行研究时,南京的国立东南大学(后改名中央大学)等其他主要大学的发展应能提供有启发性的比较和对照。”^②然而,关于中央大学历史(含南京高师和东南大学)的严肃学术论著还不多见。^③

溯及历史渊源,国立中央大学(简称“中大”)之前身为 1915 年创

① 罗志田:《乱世潜流:民族主义与民国政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13页。

② 孙任以都:《学术界的成长,1912—1949年》,[美]费正清、费惟恺编:《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卷,刘敬坤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第422页。

③ 据我目力所及,除了通行的“校史”之外,研究三(两)江师范学堂—南京高师—东南大学—中央大学的已刊专著仅苏云峰的《三(两)江师范学堂—南京大学的前身,1903—1911》(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繁体字本为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8年版)。此外,许小青的《政局与学府:从东南大学到中央大学(1919—1937)》(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和萧胜文的硕士论文《罗家伦与中央大学发展之研究(1932—1941)》(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1999年)从史学角度对中央大学(东南大学)的研究做出极为有益的探索,详后。倒是对新文化运动时期南京高师与东南大学的《学衡》杂志与学衡派的研究颇为繁盛,较有代表性的研究有沈松桥《学衡派与五四时期的反新文化运动》(台北:台湾大学出版委员会,1984年)和沈卫威《回眸“学衡派”:文化保守主义的现代命运》(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

立的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简称“南高师”)和1921年创立的国立东南大学(简称“东大”)。1927年4月,东南大学由南京国民政府接收并进行改造。同年6月,国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员会以原国立东南大学为基础,合并南京、上海和苏州的其他八个专科以上公立学校,组建成“国立第四中山大学”(简称“四中大”)。1928年2月,国立第四中山大学易名为“江苏大学”,5月正式定名为“国立中央大学”,直至1949年8月由中共南京市军管会更名为“国立南京大学”,随后又废除“国立”冠名,径称“南京大学”。

以1927至1949年为区间,中央大学与其前身南京高师和东南大学,以及之后的南京大学,既有一定的历史延续性,更有其在学术和政治上的独特性,可构成一段完整的校史。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前,位于东南学术中心的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及其后续的东南大学的地位就已十分显赫。南京政府成立之后,东南大学改组成为中央大学,成为“民国最高学府”。无论在办学规模和学术声望,还是在所获取的政治资源方面,中大都处在中心位置。抗战爆发之后,中央大学又在第一时间迁往重庆,并保全了几乎全部的图书和设备器材。在时人的印象中,战时的中央大学与西南联大是后方最富实力和声望的高等学府,而且在某些方面,中大甚至超过联大。抗战时期,中央大学地处陪都重庆,从地域和政治因素来看,其与国民政府的关系一如既往,即始终位于党国教育体制施行的中心,显然没有西南联大与中央之间的“重庆与昆明”的“双城效应”^①。

“国立”是衡量民国时期大学与国家关系的重要指标。中央大学与四川大学、河南大学等地方性大学和私立的复旦大学、南开大学相较,也不存在“国立化”的问题。但不应忽视的是,中央大学的学校行政与中央政府呈现的是一种动态的关系,与“人”和“事”相关的复杂因素往往能直接影响这种关系。而且在具体的历史场景中,这种“国立”和“中

^① John Israel, “Chungking and Kunming: Hsinan Lienta's Response to Government Educational Policy and Party Control”,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抗战建国史研讨会论文集,1937—1945》上册,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5年,第343—377页。

央化”所体现的“名”与“实”的差距有多大,还有待于进一步分析。

在学界有一种普遍的印象,即中央大学是国民党(国民政府)直接控制下的“党化”大学。如叶文心就认为中央大学是1927年国民党进入南京后直接创办的国立大学。^①不过,叶文心可能只说明了问题的一面。从“党国”体制的角度看,与先前的东南大学不同,中央大学的“国立”的确与南京的中央政府和国民党有更实质性的联系,但中央大学的整个历史又与南高师—东南大学难以截然分割,这种学术和教育体制上的关联和传承是否因为国民党掌握政权而有质的变革,还有待详审。

必须承认,“学术独立”、“学术自由”与政治干预的颉颃使近代中国大学陷于尴尬而又无奈的境遇,中央大学也概莫能外。“学术与政治”一般体现知识分子的视角和话语,应该还存在另一个视角——党国视角,和另一套话语——“国家教育与大学”。这里有一个特例:蒋介石在名义上成为中大校长后,在其言论中(未必付诸实施)所体现的是教育理论上的意识形态化和教化,而在实践经验上是仿效黄埔军校和干部培训学校模式。蒋在黄埔军校的校长经历和师生关系政治化带来的实效,构成他对学校和教育的切身体会。这提示我们在研究中央大学学术与政治的关系时,应充分顾及以上两种立场、视角、话语和经验的碰撞。以当下眼光视之极不正常和极难理解之处,或许在历史语境中自有其“合理”之处。

本书研究的主题是“学术”与“政治”,不囿于楚河汉界,均采宽泛意义行之。“学术”指涉中央大学的教育体制、教授群体、学术取向和总体性的思想文化状况。“政治”从纵切面上分为两个层次,一是校园外部的国家政治以及国民党派系政治,二是校园内部的政治生态,但二者并无截然的界限,往往交织互动。而从横向角度看,“政治”除了一般意义上的政治事件和活动之外,还包括“政治文化”。

^① Wen-hsin Yeh, *The Alienated Academy: Culture and Politics in Republican China, 1919—1937*, Cambridge, Mass.: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 Harvard University, 1990, pp. 119—121.

“政治文化”(Political Culture)概念一度风靡于 1950 年代末到 1960 年代初的欧美政治学界,被誉为在政治学理论中跨越了“微观—宏观”的鸿沟。但到了 20 世纪 70 年代后,“政治文化”的概念在学术时尚中逐渐式微,被批评为保守(conservative)、静态(static)和指义累赘的(tautological),忽视了权力关系,并无法解释政治的变迁。^①当然,“政治文化”在西方政治学语境中本身并非确指,含意也更具开放性。^②近年来,中文学界也经常运用“政治文化”的概念,对与“政治”和“文化”两个范畴均有关联的问题进行阐释。诚然,“政治文化”具有舶来性,内涵和外延也不固定。但本书仍试图援引这一概念工具来考察中央大学校园内外政治氛围的互动关系和“学术界”的政治运作路径,以及政治性事件背后所蕴含的政治思维和行为方式(这本身又与“文化”有密切的联系),尤其是那些长时段内积淀的惯常性政治特征。当然,本书对“政治”尤其是“政治文化”的讨论尽可能的“见之于行事”,将问题落实在具体的人和事之中。

本书作为中国大学史、教育史和文化史中的个案研究,属于广义的“校史”。无论建校时间长短,几乎所有的中国大学都有校史。该类校史多为校方为接续传统或回顾本校光荣历史而作,普遍存在结构简单和价值取向偏一的缺陷,而且在学术规范方面亦有所不足。

近年来,学界涌现了许多“中国大学史”的论著,其学术关怀和指向与狭义的“校史”模式颇异。具体到中央大学的历史,萧胜文的硕士论文《罗家伦与中央大学发展之研究(1932—1941)》和许小青的专著《政局与学府:从东南大学到中央大学(1919—1937)》,是目前少有的将中央大学纳入近代中国政治与社会变迁中进行探讨的校史论

^① Michael Thompson, Richard Ellis, Aaron Wildavsky, *Culture Theory*, Boulder, San Francisco, & Oxford: Westview Press, 1990, p. 215.

^② 例如,美国政治学大师加布里埃尔·A. 阿尔蒙德就认为“政治文化”是包含“政治态度(attitude)、价值(values)、感觉(feelings)、信息(information)和技能(skills)的一种特定分类”。参见 Gabriel A. Almond, G. Bingham Powell, Jr. (general eds.), *Comparative Politics Today: A World View*, New York: 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 1992, p. 39.

著。简单说来,萧文主要以长校十年的罗家伦为中心,关注罗家伦对中大的型塑和贡献,研究路数偏于传统意义上的“教育史”一线。许著后出,较之萧文更能在历史语境中探讨从东南大学到中央大学的深刻转变,并特别关注国家(北洋时期的北京政府、江苏地方政府和1927年后的南京国民政府)、政党(国民党、中共和国家主义派)与社会的因素,对具体的历史细节的建构也很是严谨。这两部论著在时段上和本书的内容有交集,提供十分重要的启迪,其问题意识和研究方法也值得借鉴。同时,许著涉及的某些问题也给予本书以对话的共同空间。另外,牛力新著《罗家伦与国立中央大学》(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对罗家伦执掌中大时期诸要事进行探讨。

正如越来越多的学者所注意到的,不仅外部的社会政治环境对大学产生深刻的影响,而且大学内政治文化气氛同时也折射出所处时代的种种特征。叶文心着力刻画1919—1937年中国不同类型高等院校中的不同文化风格和政治取向(侧重上海地区)。她在著作中对英语教育在中国不同类型大学所采取的不同方式、基督教圣约翰大学与上海资产阶级文化、私立大学与中产阶级、上海大学与1927年的中共革命、国民党“党化”教育以及后五四时代的学生文化等具体问题进行了论述。^①与叶文心同为已故著名汉学家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学生的魏定熙(Timothy Weston)在中国大学史研究中较早地运用了“政治文化”的概念。他讨论了北大早期历史中文化与政治的关系,指出蔡元培在1917年出任之后使北大在政治和文化两方面都有了鲜明的变化,但越到后来,教育与政治之间的界限越变得模糊,文化模式被赋予了政治意义。^②王东杰通过对四川大学国立化进程的研究,展示了中央与地方关系、国家与大学关系及地方

^① Wen-hsin Yeh, *The Alienated Academy: Culture and Politics in Republican China, 1919—1937*.

^② [美]魏定熙:《北京大学与中国政治文化(1898—1930)》,金安平、张毅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Timothy B. Weston, *The Power of Position: Beijing University, Intellectuals, and Chinese Political Culture, 1898—1929*,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4.